

- 中國古代史研究序論
- 南朝典策制度考略
- 卜辭伊尹龜示考
- 《老子》古語新證
- 關於《算經十書》的校勘
- 天一閣藏《天聖令·賦役令》初探
- 明人文集題記
- 《古今圖書集成》的按注研究
- 《詩經》“于V”式研究
- 《全唐詩》歌謠識謄考

顧頡剛 講 李得賢 記錄
高敏 張旭華
劉宗漢
連劭名
郭書春
戴建國
趙萬里
裴芹
蕭旭
湯華泉

文史

W E N S H I

二〇〇〇年第四輯 總第五十三輯

中華書局

K206
6-53

文史

2000 年第 4 輯

總第五十三輯

中華書局編輯部編

中華書局出版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文史.總第53輯.2000年第4輯/中華書局編輯部編.

-北京:中華書局,2001

ISBN 7-101-02547-1

I.文… II.中… III.文史-研究-中國-文集 IV.K207-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0)第 28305 號

責任編輯:張 耕 汪聖鐸

文 史

2000年第4輯

總第五十三輯

中華書局編輯部編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豐臺區太平橋西里38號 100073)

北京冠中印刷廠印刷

*

787×1092毫米 1/16·20¹/₂印張·383千字

2001年4月第1版 2001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2500冊 定價:29.00元

ISBN 7-101-02547-1/K·991

編委會名單

主編 宋一夫

編委(依姓氏筆畫排列)

田餘慶	任繼愈	安平秋	李學勤	李家浩	吳榮曾
吳樹平	宋一夫	季羨林	周紹良	金開誠	岳慶平
俞偉超	胡平生	徐蘋芳	袁行霈	陳金生	陳高華
陳祖武	陳鐵民	啓功	張岱年	張澤咸	張傳璽
費振剛	曹道衡	崔高維	董乃斌	裘錫圭	楊牧之
樓宇烈	寧可	閻步克	龔書鐸	汪聖鐸	

目 錄

中國古代史研究序論.....	顧頡剛講 李得賢記錄(1)
周代婚禮:六禮抑或三禮?	陳筱芳(17)
論王莽與今古文經學.....	楊天宇(29)
南朝典策制度考略(上)	高 敏 張旭華(45)
元代肅政廉訪司研究(中)	李治安(61)
“鍤石”考述	周衛榮(79)
卜辭伊尹羈示考	劉宗漢(91)
《老子》古語新證	連劭名(97)
北齊令篇目疑.....	樓 勁(111)
關於《算經十書》的校勘	郭書春(119)
吐魯番出土上烽契詞語輯釋.....	余 欣(133)
天一閣藏《天聖令·賦役令》初探(上)	戴建國(143)
《集古錄》名實考	顧永新(155)
《明史·選舉志》紀年考證.....	郭培貴(165)
明人文集題記(二)	趙萬里(175)
越南漢文古籍《嶺南摭怪》的成書與淵源	李時人(189)
《古今圖書集成》的按注研究.....	裴 芹(201)
《詩經》“于 V”式研究.....	蕭 旭(213)
錢仲聯先生《鮑照年譜》中存在的幾個問題.....	傅希亮(221)

八卷本《搜神記》成書時代新考	潘承玉(231)
《全唐詩》歌謠讖諺彙考	湯華泉(245)
北宋後期科舉罷詩賦考	祝尚書(275)
神話傳說與古代南方民族關係新解(上)	吳永章(281)
讀 書 劄 記 讀《尚書·虞夏書》札記	黃懷信(303)

CONTENTS

1.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2. The marriage rites during the Zhou: Six of three procedures?
3. Wang Mang and the classic scholarship of "*jīnwén*" (new texts) and "*gǔwén*" (ancient texts)
4. The rules of official documents handling in the Southern dynasties (Part I)
5. A study on the *Suzhengliangfang* (supervising officers' honesty) office of the Yuan government (Part II)
6. Notes on *toushi*
7. The oracle text of Yi Yin
8. Words in the *Laozi*: A new approach
9. The contents of the decrees of the Northern Qi: Some doubtful points
10. Ten ancient mathematics books: How to collate the texts
11. Words in the military documents unearthed from Turfan
12. The *Fy yu ling* (decree of tax and service) of the *Tianshen ling* kept in the Tianyige: A preliminary study (Part I)
13. The title and contents of the *Ji gu lu* (*Collected accounts of antiquities*)
14. The *book of officer selection* of the *Ming history*: A chronological study
15. The colophons in the collections of works of the Ming writers (Part II)
16. The origin of the *Lingnan zhiguai* (*Account of strange things south to the Ling Mountain*) written in Chinese in Vietnam
17. The editors' notes in the *Gujin tushu jicheng* (*Encyclopedia of ancient and contemporary books*)
18. The pattern "yu V" (at or to V) in the *Shi jing* (*Book of songs*)
19. *The chronological biography of Bao Zhao* by Qian Zhonglian: Some questions
20. The versions of the *Changjiang ji* (*Anthology of Changjiang*)
21. A study on the prophetic songs in the *Juan tang shi*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ang poetry*)
22. Abolition of the poem writing test in the civil examination of the late Song: A study
23. The myth and the nationalities in ancient south China: A new approach (Part I)
24. Miscellaneous research notes

中國古代史研究序論

顧頡剛講 李得賢記錄

我從事中國古代史的研究工作，已近三十年，這次來蘭大，想把三十年來研究的心得，作一番系統的講述與檢討，不過三十年來所致力於的，大半偏重於零碎問題的考據與研討，整個的來做一番系統的研究，這還是第一次嘗試，恐怕不一定能講得好的。

談到系統，說的人很多，但是一種有系統的學問，真是談何容易！學問的起源，是由於假設而來的，因為上帝並沒有給人們以分門別類的學問。有了假設以後，得着大家的承認，就變成了常識。如從前人說：“地是方的”，這就是假設。這假設經許多人承認，遂變成常識了。可是經過若干年以後，這種常識被人發現了破綻，而認為不正確時，便不得不有新的假設，於是又有人說“地是圓的”來推翻前者的說法了。這種新假設，經大家公認後，又變成了常識。所以常識是時時受學問的指導而改變着的。所謂學問，就是這樣繼續不斷地提出新的問題，得到新的結論，來提高或改變一般人的常識。所以研究學問的人，必須先有充分的常識，來鞏固研究學問的基礎。諸位同學現在所有的知識，必須自己承認，這都是常識而不是學問，然後方可得到勇猛精進的道路。

什麼是學問呢？拿現在的話來講，“學”是搜集材料，“問”就是提出問題。所以學問必須搜集材料，然後纔能提出有價值的問題；同時也可以說，必須心中有了問題，然後眼中找得到材料。所以，“學”與“問”是要相輔而行的。孔子曾說過“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可見“學”與“思”是要並重的。這裏所說的“思”就是“問”，因為要提出問題，必須先費一番思考的。“學”與“問”並行而不偏廢，纔是研究學問的真精神。

依據上面的講述，我們可以把有史以來中國學術思想分為下列四個時期：

- (一)王官時代——戰國以前(為貴族保存材料)
- (二)諸子時代——戰國(以自己思想指導時代，修改舊日傳統材料)
- (三)經學時代——漢以後(以經典為信仰中心)
- (四)史學時代——清以後(以經典為研究古代社會的對象)

更綜括起來說，王官時代的學術是因襲的，諸子時代是創造的，經學時代是信仰的，史學時代

是研究的。

一、王官時代

中國史上有文字記載，是從殷商時代開始的，前此的史事，因為沒有文字記載，很多無法考證。在商、周時代，一切學問都在王官手裏，是即所謂“王官之學”。“王”是指當時的貴族階級，“官”就是官守。所以那時候的學術，為貴族階級所特有。貴族家中，設有禮、樂、史、卜等官，分別執掌其事。茲分別舉例略為說明如下：

禮官：禮是維持貴族社會的地位的工具，當時貴族為了要鞏固他們的社會地位，要提高他們的身份，所以便設禮官執掌這種職務。禮官所執掌的禮，可分為家庭、朝廷、地方及軍事等四類：

甲、屬於家庭方面的禮：

- (1).冠禮——古時男子二十而冠，是一種表示成人的儀節。
- (2).昏禮——“昏”就是後來的“婚”字，古人於天昏時結婚，所以叫做“昏”。昏禮便是結婚的儀節。
- (3).喪禮——是喪葬的儀節。
- (4).祭禮——是祭祀的儀節。

乙、屬於朝廷方面的禮：

- (5).朝禮——朝覲天子的禮節。
- (6).聘禮——聘問他國的外交禮節。

丙、屬於地方方面的禮：

- (7).射禮——鄉射是地方上習武的一種儀式。
- (8).鄉禮——就是鄉飲酒禮，是尊重一鄉中高年和有德者的禮節。

丁、屬於軍事方面的禮：

- (9).軍禮

以上冠、昏是嘉禮，喪是凶禮，祭是吉禮，朝、聘、射、鄉是賓禮，連軍禮合起來，又通稱為吉、凶、賓、軍、嘉五禮。這五種禮都有一定的儀式，都歸禮官所執掌。他們傳留下來的記載，就是現在《十三經》中的《儀禮》。

樂官：樂官是執掌朝廷及宗廟音樂的官員，在朝廷及宗廟中行禮時都要奏樂，帝王和貴族在起居宴飲時也要奏樂的，所以形成了當時貴族社會的重要生活的一部分。那時的樂器，可分為八種：

(1).金——鐘

(2).石——磬

(3).絲——琴、瑟

(4).竹——簫

(5).匏——笙

(6).土——敔、埙

(7).革——鼓、鼗

(8).木——祝

樂官所傳有兩部分，一是歌詞，即《詩經》，一是樂譜，可惜樂譜後來竟失傳了，沒有遺法可循。現在留下的只有《詩經》，都是當時的樂歌。《詩經》共計三百零五篇，通常稱做三百篇，分南、風、雅、頌四類，實際上這四類並沒有太嚴格的區別，大致說來：

南和風：是各國民間的歌謠，屬於地方性的。

雅：是在朝廷上奏的樂章。

頌：是在宗廟中奏的樂章。

這三類詩，在當時都能歌唱，可惜樂譜業已失傳，現在留下這部美麗的詩集，只供我們閱讀了。

史官：史官是為當時貴族保存歷史記載和史料的，他們傳下來的東西，有《尚書》與《春秋》兩部書。《尚書》中包括有典、謨、誥、誓等幾種體裁的文字記載：

典——相當於今所謂紀事本末。

謨——就是後世的奏議一類的東西。

誥——是帝王的詔諭。

誓——是出征時的誓師辭。

以上典是記事的，謨、誥、誓都是記言的。

《春秋》是一種編年體的記載。“春秋”二字，是“因春以包夏，舉秋以兼冬”，即是指年月的次序而言。所以《春秋》記事，處處繫以年月日，例如

某年春王正月……（因《春秋》是魯史，故奉周建子的曆法。）

夏四月……（該月中雖無事可記，也得將月份寫出。）

秋七月……

冬十月……

卜官：商、周時迷信鬼神的風氣很濃，一切行事都要預卜其吉凶，商代占卜，是用甲骨，今所發現者有殷虛《卜辭》；周代則用蓍草。《周易》一書，就是卜官傳下來的。用蓍草占卜時，單數為陽爻，它的符號是一，雙數為陰爻，符號是--，將這兩種符號三次排列，便成了下面的八卦：

三（乾） 三（坤） 三（震） 三（坎）

三（艮） 三（巽） 三（離） 三（兌）

拿這種符號來代表人，則乾為父，坤為母，震為長子，坎為次子，艮為少子，巽為長女，離為次

女，兌爲少女，剛好是一個八口之家。集爻爲卦，卦與卦再相配，便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每爻註上一兩句繫辭，以此來占卜吉凶。後人更把它看作宇宙的最高原理，他們以爲三百八十四爻，已够說明宇宙間的一切。又有人以它爲做人的原則，例如他們拿陽爻代表剛，陰爻代表柔，說做人應剛柔相濟。所以一部《易經》，對於中國的精神文明（宇宙觀和人生觀）影響極大。

以上四官，傳有《五經》（《樂經》已失傳），這就是王官之學。從這些材料中，我們可以看出商、周時代的社會情形及制度來。

二、諸子時代

諸子興起的時代背景：諸子學說的興起，是與當時的時代有極大關係的。西周是貴族社會，故產生王官之學，到了春秋末年以迄戰國初年，周王室漸衰，戰爭頻仍，社會上發生了劇烈的變遷，交通發達，商業也日趨繁榮，貴族階級不能應付這種劇變的社會局勢，封建制度爲戰爭所破壞，便日趨於沒落，於是平民階級便應運而興起。諸子的學說，正代表當時的時代思潮。諸子學說從春秋末開了頭，到戰國時爲最盛行的時代，也是中國文化發展得最輝煌的時代。孔子便是諸子中的第一人。他們的學說，雖也由王官之學中蒐得材料，但我們可以說：真正的學問是始於諸子的。因爲他們的學問較王官之學有見解，有思想，富有創造性，是對當時的社會對症下藥的。

諸子的學說：春秋時戰爭最多的是晉國與楚國，孔子生於春秋末年，那時晉、楚已不大作戰，社會比較安定。《史記·孔子世家》說：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共有三千人。其中通六藝的有七十二人。孔子有弟子三千，這個說法是不大可靠的。三千人不過是表示人數很多罷了，正如孟嘗君食客三千，平原君門下也有三千等的說法是一樣的意思。孔子既以《詩》、《書》、《禮》、《樂》教弟子，他的教材，還是取之於王官。同時孔子自己也是個小貴族（他的弟子也有許多是貴族）。所以他的思想有濃厚的封建色彩，並且還是一個封建制度的擁護者。因此他只想恢復過去的社會制度，而沒有開創新時代的計劃，所以他非常痛恨破壞當時社會制度的分子，這般人在他眼中都是亂臣賊子。相傳他作《春秋》，也是基於這個立場，所以說“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以後諸子興起，却一致推翻了貴族階級，這是孔子所沒有料想到的。

孔子死後不久，便有墨子繼起，墨子的國籍大概不出宋、魯二國。他出生時，大概孔子剛死。他對王官之學也很有研究，但他能認識時代，思想較孔子爲解放。他認清尊尊貴貴的傳統思想已不適用於當時的時代，因此他提出尚賢、尚同及非攻等的主張來。他特別提倡尚賢的學說，主張以全國最賢的人來居最高的領導地位，惟有這樣，平民纔能代替貴族的地位，而

徹底打破階級制度。這樣以最賢的人做天子，次賢的做諸侯，再次賢的做大夫，然後人民的意志上合於大夫，大夫的意志上合於諸侯，諸侯的意志上合於天子，天子的意志上合於天，天下自然會大治了。因為要尚賢，他又提倡尚同，凡是在下位的人，都要追隨賢者，以賢者的意志為意志。天子既然是最賢的人，諸侯亦是次賢的人，則各國之間的戰爭自可免除，因此他又主張非攻，這就是墨子理想的大同世界。他還有一點跟孔子不同的，便是孔子的弟子毫無組織，而墨家門徒却為一有組織的團體，他們都絕對服從鉅子（領袖）的命令，有赴湯蹈火，為別人犧牲的精神，是極端的救世主義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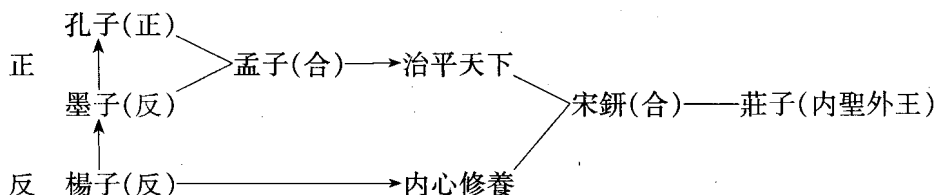
孔、墨兩家思想互相牴牾之處甚多，同時孔子也尚嫌貴族化一點，因此平民化的墨子非常反對他。墨家學說，無疑的是儒家的反動，不過他們也有其相同的地方，那便是孔、墨兩家都是希望有一個安定的社會，在思想上都共同是向外發展的。

儒家一派的孟子，可以說是調和儒、墨的一個人物，孔、墨兩家的思想，在《孟子》一書中都可以看到。如孔子尊尊，墨子賢賢，孟子則並二者而有之：孔子言仁，墨子以仁義為天下的大利，《孟子》中也處處談仁義；孔子說家有等差——貴族之家與平民之家，《孟子》中所主張的却是八口之家，與封建制度似沒有關係，而却與墨子的兼愛思想相合。所以孟子雖然在表面上痛罵墨子，實際上他却接受了一部份墨子的思想。無論是孔、墨、孟，他們都是想平治天下的，也就是說他們都是向外發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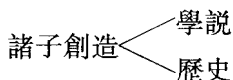
孔、墨、孟三家以外，有一位跟他們站在相反立場的人，便是楊朱。關於楊朱的學說和時代，古書上記載的很少。《孟子》上批評他是“為我”主義，這個“為我”，就是“輕物重生”。他將自己的生命看得很重，不願為外物而傷其生。所以他提出“全生保真，不以物累形”的口號，勸人不要忘記了自己。他的這種主張，恰好與孔、墨、孟三家相反，是代表向內發展的一派。

宋鉞是一個調和楊、墨的人，墨子主張非攻，他主張救門寢兵，楊子要全生保真，他也主張減少情欲。他的學說是要以楊朱“為我”之說來治身，而以墨子之說來救世，同時他也不非毀儒家的仁義禮樂。《莊子·天下篇》說他“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淺為內”，正可以看出他調和儒、墨、楊的宗旨來。後來莊子所謂的“內聖外王”之學，就是由宋鉞而來的（按宋鉞所著書，久已失傳，近由郭沫若先生的考證，纔將他的遺著《心術》、《內業》兩篇，從《管子》提認出來，詳見郭著《青銅時代》一書中《宋鉞尹文遺著考》）。

依據上面的分析，可拿正反合的法則列表說明如下：



諸子之學，都富有創造性，都想改革當時的社會。他們濟世救民的主張，都是對症來下藥的。我國學術思想以戰國時代最為發達，就是因為有諸子的興起。不過諸子在當時還不能完全脫離王官之學的藩籬，因為他們所需要的材料，都還不能不憑藉《六經》，可是《六經》的材料仍然嫌太少，不夠他們充分應用。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便不惜創造歷史，以為他們託古改制的根據。如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便是很顯明的例子。《禮記》上也說：“毋勸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也是同樣的意思。堯、舜與先王，距離孟子不知已有多少年代，記載本來就少得很，但孟子為了要符合他言必稱堯、舜的學說，便不得不從他的腦筋中虛構出一個先王的輪廓來。這種創造歷史的學說，是諸子學說的一大特色。康有為《孔子改制考》一書，就是說明諸子的學說大多是“託古改制”的。茲再簡單的列一個表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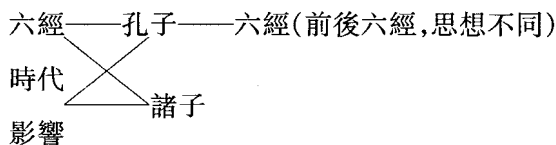


戰國諸子很多，其前期諸子的思想界限，比較顯明，至後期諸子學術思想，因受各方面的影響，分析起來，比較複雜困難，這裏只以前期諸子來做個例證，其他暫不詳說了。

諸子與《六經》的關係：康有為所著《孔子改制考》，是一部劃時代的著作，不過這個名稱，應改做“戰國諸子託古改制考”，因為孔子尚無改制思想，還沒有想到改制，到戰國諸子纔有這種改革舊社會的思想的。康有為認為《六經》皆孔子所作，照他說來，孔子與《六經》關係是這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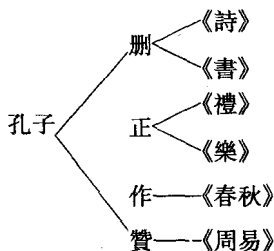
孔子——六經——儒家

但據我前面所說的話，則諸子與《六經》的關係却是這樣的：



諸子的學說，都是對當時的社會對症下藥，這即是他們所受的時代影響，但是對於古代的知識，他們知道的並不多，所以又不能不借重《六經》，因而形成了上表所列的那種錯綜複雜的關係。

據《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與《六經》的關係是這樣的：



據《孔子世家》說，《詩》原有三千多篇，《書》有二萬多篇，都嫌太多而零亂，所以孔子把它刪去一部份。《禮》、《樂》是實際的規範與儀式，其已經不適用的，便加以改正。《春秋》則加以筆削（筆即改，削即是刪）。《易》的卦爻辭是經，《易傳》則是孔子自作（？），是用來解釋經的，所以叫做贊。《史記》上這種孔子曾整理六經的說法，比較的公道而正確。但康有為却為什麼說孔子作《六經》的話呢？他也自有他的道理。他認為《尚書》中《堯典》、《皋陶謨》兩篇與《論語》中孔子的思想相同。其實《堯典》與《皋陶謨》乃是後來孔門弟子或再傳弟子根據儒家思想所偽作，《論語》也出孔子弟子所纂輯）所以孔子以前的《六經》與孔子以後的《六經》，顯然不同。孔子以前的《六經》是貴族家中物，而影響於諸子者頗大，孔子以後的六經，則又多受諸子的影響，且經過儒家的修飾與潤色。此外墨子是不相信命的，他在《非命篇》引《尚書》桀事說：

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

又引《尚書》紂事說：

我生不有命在天。

以證明“命”的不可靠，而孔子却說：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與墨子的說法完全不同，說不定墨家在當時也有墨家的《尚書》（就是由墨家竄改以迎合己意的《尚書》），以作他託古改制的憑藉。因為戰國時的經、子經過這樣的竄亂混淆，故頭緒紛繁，諸子與六經的關係，一時不易分得清楚。

漢武帝時，因聽董仲舒的建議，絕百家之言，而獨尊儒術，所以漢代的經學獨盛，一直到宋、明，政府與學術界，仍然以經典為信仰的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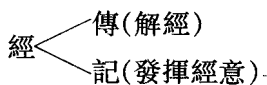
三、經學時代

漢以後的經學時代：漢代為一規模宏大的帝國，為了要維繫人心，使一般人有一個中心信仰，以鞏固其王權，所以聽董仲舒的話，一切都以經典為準。他們將偏重倫理的經，看作天經地義，完全把它神秘化。董仲舒說：“天不變，道亦不變。”就是這個意思。

漢人所第一標榜的是“通經致用”，這以今日的眼光看來，當然是很可笑的。經是周代的

書，而拿它來做漢代人的用，這怎麼可能呢？但是他們却大聲喊出了：“以《春秋》斷獄，以《禹貢》治河，以《詩》三百篇當諫書”的口號。漢代自有律例，而他們却喜歡以《春秋》斷獄，取《春秋》一字褒貶之義；《禹貢》上只言山川、土壤、物產等等，並沒有說治河的話，而他却主張用以治河；《詩經》上雖也有勸諫帝王為善的篇章，可是其中還有許多是男女戀愛的情歌，難道也以情歌來當諫書嗎？這不免太荒謬了！可見當時真成了“經書狂”的時代，盡量把經來神秘化，宗教化，凡是對經發生一點懷疑的人，都給他加上個“離經叛道”的罪名。因此經師的地位也就特別提高，正如歐洲中古時代教會中的神父一樣了。經書的地位當然更要來得高，然經書數量究竟太少，總嫌不夠應用，不得不設法增加。秦代焚書，有些人把書藏在牆壁中，漢代欲求發現，遂有壁中書出世。書的數量雖然加多了，但也就演出了今古文之爭（今文的本子，是用漢代通行的文字隸書寫成的，古文是壁中書，用漢以前文字籀書寫成的）。

古文出於西漢，當時所發現的古文經很多。西漢承平二百多年，宮廷內藏書，自然非常豐富。成帝河平中，劉向受詔校理宮廷藏書。劉向死後，由他的兒子劉歆繼續奉命整理。在他們校理時，便於其中發現了古文《春秋左氏傳》、《毛詩》及《逸書》、《逸禮》。經與傳的關係是這樣的：



《春秋》是經，《左氏傳》是解《春秋經》的，所以叫做《春秋左氏傳》。《毛詩》是毛公所作的《詩》傳。《尚書》原僅有伏生的二十八篇，西漢中葉又發現《泰誓》一篇（中間包括三篇），共是二十九篇。《逸書》發現，遂又增多了十六篇。今文《儀禮》原只十七篇，發現的《逸禮》共三十九篇。內有《王居明堂禮》、《巡狩禮》、《奔喪禮》、《投壺禮》等。在西漢哀、平以前所立於學官的經，都是今文。到哀帝時，劉歆請將《逸書》、《逸禮》、《毛詩》及《春秋左氏傳》等四種古文經立於學官，哀帝下其議於博士，當時博士都竭力反對。這些博士們所持的反對意見，已無從詳細考究。惟據劉歆致博士們的書信看來，知道博士們是“以《尚書》、《禮》為備”，並說：“左氏不傳《春秋》（按今文以公羊傳《春秋》）。”這件事情鬧得很大，博士們以劉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而皆起怨恨。使得劉歆感到恐懼，而請求由中央調補地方官。但劉歆與王莽很友善，等到王莽當權，終將此四種古文經及《周官》、《樂經》、《爾雅》等同立於學官，於是今文漸廢，古文經盛極一時。後來王莽失敗，古文經雖不立於學官，而民間傳授仍然很盛。今古文的爭論，實是當時一個很大的問題。自西漢末年一直延續到東漢末年，達二百多年之久。直到鄭玄出來徧注群經，混亂今古文家法，這種熱烈的爭辯，纔暫行休止。

當今古文家互爭短長的時候，許慎著了一部《五經異義》，從事分析今古文的異同，這種分析工作，很有見解。現在就來舉幾個例在下面：

九族：

(今文)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

(古文)自高祖至玄孫。

婚姻：

(今文)男三十，女二十，天子與庶人同。

(古文)國君十五生子，庶人二十而嫁，三十而娶。

田賦：

(今文)十一而稅。

(古文)國中園廛之賦，二十而稅一，近郊十而稅一，遠郊二十而稅三。

服役：

(今文)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

(古文)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

由上面所舉幾個例看來，今古文經不但本子不同，而且意義也不同，令人莫知所從。漢儒治經，不能不有家派，就是這個原因。因為有了家派，今古文便各立門戶，壁壘森嚴。今文學家斥古文學家為“顛倒五經，變亂師法”，而古文學家則譏今文學家為“專己守殘，黨同妒真”。真好像有點現在的黨派之爭了。

這種熱烈的爭論，到後來為什麼却漸漸歸於熄滅，竟連所謂今古文經傳的區別都不太明瞭了呢？這不能不歸功(罪)於東漢末年一般所謂的通學者了。鄭玄與馬融就是這種通學者的代表人物。這輩通學者的本意，或者以為今古文相互攻擊，為經學界不幸現象，為息事寧人計，因而恃其博學，參互雜糅兩家之說，藉示調和。然而今古文的家法，却因他們的調和而混淆了！現在我們若要想恢復當時各不相謀的今古文原來面目，是一件極端困難的事！所以漢代雖為經學最發達的時期，同時也是經學最紊亂的時期。我們現在要研究經學，探求這種真象，若不抱“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是不會有成的。

若用正反合的法則來看，今文與古文經，是一正一反，而鄭、馬之調和二家是合。關於他們這種調和的說法，也可舉個例子如下：(古代公侯伯子男的封國面積)

(今文)《禮記·王制》：

公侯皆方百里

伯七十里

子男五十里

(古文)《周官·職方氏》：

公方五百里

侯方四百里

伯方三百里

子方二百里

男方百里

二家說法，不但不同，而且差得很遠。現在再來將這兩種封國面積列表比較一下：

		今 文	古 文
總面積		9000000 方里	100000000 方里
封 國	公	10000	250000
	侯	10000	160000
	伯	4900	90000
	子	2500	40000
	男	2500	10000

據鄭玄解釋這種差異的由來是這樣的：

周武王初定天下，……猶因殷之制，以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

他的意思是說《王制》所載是周武王時的制度，武王時土地狹小，所以封國面積也小；《職方》記載則是周公時的制度，周公東征獲得了許多新的土地，國家版圖擴大了，因此封國面積也隨之擴大。這種說法通是通了，但是不是事實呢？武王與周公年代相差有限；周公東征雖獲勝利，但土地面積一時不能就擴展得那樣大，並且分封土地要受地形的限制，也決不會那樣整齊劃一。所以經學經這般通學者愈說愈糊塗。因為他們太主觀，在沒有可資證明的材料時，就憑着想像，自己創造出一些材料來，結果弄得不合實際。其實今古文經各有其不同的時代背景；今文經出於西漢初年，當時國家版圖尚小，後來經雄才大略的漢武帝開疆拓土，纔造成一個規模宏大的帝國。古文經就是在這個時代（西漢末年）出現的。西漢初與西漢末的疆域相差很遠，故兩時代所言封國面積也就不同了。可是當時沒有一個人敢對經書發生懷疑，沒有一個經學家敢大膽地說《禮記》、《周官》是漢代的作品，當然愈弄愈糊塗了。再說五等爵，公在殷商，只是先祖之稱，並非爵名。殷時封爵，僅有侯與男，而男又附屬於侯國，並沒有五等爵之存在。那麼為什麼後來有五等爵的說法呢？這似乎不能不牽涉到《春秋》，因《春秋》中有這種爵名的記載。不過《春秋》所記載的公就是君，原為一種普通稱呼，伯即是長，如家庭中長子就稱伯，子則是王子，那麼公、伯、子都是家庭中的稱呼，與後世所附會者並不相合，所以五等爵是起於周朝末年的一種學說，因有人想將大小不同的國分出等次，乃將公、